

目 录

胡允恭	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	1
	——代传略	
陈文瑛	父亲在大陆最后的日子·····	43
<u>陈 仪</u>	被捕后的四封信·····	62
	附件：国民党政府对陈仪的判决书··	67
姜茂生	张鼎丞同志在闽西南和豫皖苏边区··	70
吕光光	抗英英雄于渊烈士生平·····	88
朱 哲	佛门擎天一柱·····	95
	——巨赞法师生平事略	
戒 圆	巨赞法师在湖南的抗日活动·····	109
沈 醉	我与巨赞法师的相识·····	114
王瑞堂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市各界人士代 表团”出城与解放军谈判经过····	117
段苏权	回忆赤峰、承德军调执行小组的 斗争·····	125

李梅甫	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始末·····	135
许为通 严金明	浙江第一儿童保育院概述·····	149
孔昭锐	浙江第一、二儿童保育院点滴回忆··	162
张友渔	我所经历的营救工作·····	167
韩铁声	旅苏二十四年·····	173
范征夫	争取大刀会 打击敌伪军·····	196
唐建贵	重庆谈判时担任毛主席警卫的经过··	205

人 物

费侃如	李德其人·····	212
简阳县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组	海军起义将领毛却非烈士小传·····	227

陈仪在浙江准备 反蒋纪实

——代传略

胡允恭



胡允恭同志

胡允恭，安徽寿县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主编、北伐军第三十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驻烟台军事特派员、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一九三二年，胡允恭同志被王明路线排挤出党，一九四六年经福建省委批准恢复党籍。解放后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一九五一年被停止党籍。打倒四人帮后，中央书记处重新调查研究了胡允恭同志的历史，对他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恢复了他自一九二三年以来的全部党籍。

胡允恭同志一生经历非常坎坷，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特别可贵的是他被王明路线排挤出党的十几年中一直坚持信仰，不懈地为党工作，对陈仪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思想转变起了促进作用。本文即是他这段工作的纪录。

作为一个混迹于国民党官僚体制上层的官员，陈仪

从政几十年，不可避免地会做许多反共反人民的事。比如十九路军发动反蒋运动时，他是站在对立面的；又比如主闽时期，他在全国各省中首先提出并实施征粮的政策，搞得福建人民苦不堪言……这些都有公论。本文主要叙述陈仪的思想变化过程，对他的劣迹未加详述。欲详细了解陈仪，请参阅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回忆陈仪先生》。

——编者

新春将至，陈仪先生牺牲在蒋介石的枪口下转眼已届三十五周年。抚今思昔，不胜感慨。在我与他交往的十数年中，他经历了艰难的求索，经受了惨痛的教训，终于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本质，从尽心竭力为之服务转而决定反蒋，投向人民阵营，最后不惜以生命换取真理。我一直想为陈仪先生写一本传记，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今已八十有三，余年无多，而且力不从心，因此找出六十年代旧作加以整理，作为代传略，以为纪念。

早年略历 结识汤恩伯

陈仪（字公洽，一八八三——一九五〇）是浙江绍兴人，中等地主家庭出身，有同母兄一人——公孟，异母弟二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权、公亮。陈仪幼年读过私塾，中学毕业后，于一九〇〇年赴日留学，先在士官学校毕业，再进日本陆军大学，一九〇七年毕业回国。时清政府已届崩溃边缘，在军界获一官半职相当困难，不得已商之公孟和朋友等，集资在苏北开办一所农

场，规模较大。当时陈仪已有实业救国的思想，对农场曾经着意经营。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但对农场经营无法实行资本主义方式，只能靠雇佣农夫实行手力耕。



一九二八年赴德国考察团合影。

因此，他和雇农间的矛盾，一开始便

后立者为陈仪，前排左起：李巍、胡庶华（同济大学校长）、项经方（陈仪之婿）。

存在着，农场的产量还不及个体农民。加以陈仪等人对旧式农业完全是外行，所以他们的农场仅仅两、三年便自行结束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陈仪参加浙江独立运动。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诞生，陈仪被推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相当于厅长）兼任陆军小学校长。

据陈仪平时自诩：他担任好几年浙江陆军部长、陆军小学校长，都不能说有什么成绩，唯有于无意中收了一个学生汤恩伯，总算对国家有了“贡献”。由于汤恩伯和陈仪的历史关系相当深厚，最后又恩将仇报，在这里必得先叙述一下他们之间的因缘巧合。

一九一二年春初，陆小已经开学上课，陈仪忽然接到由小饭店寄来一信，是青田人小学毕业生汤恩伯写的。自称原来家道可称温饱（地主），不料迭经丧败，家道中落，不能升学。既知陆军小学招生，因筹借旅费困难，赶到杭州，却已开学，困在饭店，毫无生路，想求见大人（指陈仪），伸手求救，不敢贸然前

来，故函求大人赐见（大意如此）。

陈仪派人把汤恩伯找来，汤一进办公室，便跪下叩头，继而泪随声下。陈仪令他站起说话，汤不肯。教人把他扶起，汤恩伯总是要求援救。陈仪赠五元大洋，给他作回家路费，汤不肯收，一再要求入学。陈仪看他身体结实，年才十八岁，收为旁听生，如考试及格，可升正式生。

同年五月，袁世凯政府电令浙江陆军小学挑选四名学生送北京，准备派赴日本学陆军。陈仪选派的四人中有一人叫汤恩伯。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了，陈仪不久也被解除了浙江的两种职务，闲住在上海。后来进了某私营银行，担任襄理。这年汤恩伯回国也在某银行做小职员。

一九二二年陈仪在上海偶然遇见孙传芳。他们原是日本士官军校同学。据陈说，孙对他十分亲切，坚决邀他担任师长，陈仪于是又任了军职。汤恩伯便跟着他做连长，后升营长。

一九二六年，广东北伐军抵定武汉，蒋介石部队到了南昌，革命军势力正在扩展。孙传芳在长江下游的部队和国民革命军形成直接对垒的态势。孙部师长陈肇英被蒋介石收买，当了虎门要塞司令，孙传芳大为震动。

陈肇英也是浙江绍兴籍，日本士官军校毕业，是陈仪的同乡。因此，孙部的军长、师长大呼，要求将陈仪拘留交军法处严审，于是陈凭空被逮捕审问。过半年，查明陈肇英和陈仪不是同宗，也不是同期同学，而且向有矛盾（日后陈仪在福建省政府任主席，陈肇英任福建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矛盾更尖锐），于是陈仪又被无罪释放。孙传芳当面向他道歉，挽留他再担任师长，他坚决辞去，回到绍兴原籍闲居。时汤恩伯当营长不久，连带去职，无家可归，

也随陈仪到了绍兴，住在陈家，等于陈仪的儿子。据陈仪的女儿陈文瑛于解放后告诉我：她初次见汤恩伯称他为叔叔，汤偁促不安，坚嘱文瑛称他为大哥，他称文瑛为妹妹。可见关系之深。

汤恩伯比陈仪小十四岁，方在壮年，陈仪认为他可以深造，私人资助他再到日本求学，汤恩伯由此进了日本陆大。

陈仪有时到上海在陈文瑛家中闲住，有时乡居，经常研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喜欢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自谓对董仲舒学说有体会，所以做官没有贪污的坏名。这是他的优点。

进入蒋家政权体系 入主福建

陈仪原来不是国民党党员，更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和李根源（艾思奇同志的叔父）、杨永泰、张群等都是老同学、老朋友、盟兄弟。有人说他是政学系，也是政学系创始人。陈仪做国民党官员时期，虽未公开承认过，但已众所周知。

一九三〇年陈仪由老同学何应钦推荐，担任蒋政权的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但蒋介石对他并不重视，他本着“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原则，努力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被何应钦所赏识，蒋介石也略略知道有陈仪这人在替他努力。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蒋介石开始搜罗对日本国情有研究的人员，陈仪才和蒋有接触的机会。一九三三年冬，十九路军在福建创立人民政府，发动反蒋抗日运动。失败后，蒋介石任命陈仪为福建省府主席。

福建早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禁脔，远在一九一五年向袁世凯

卖国集团提出“二十一条”时，即蛮横要求：“东南沿海岛屿，不得租让他国。”厦门、福州邻近台湾，日本更加重视。十九路军退出福建后，日寇派遣大批特务、浪人立即混入福州、厦门，公开地在大街、通衢设立烟馆、妓寮、赌场，广招游民，收买汉奸，扩充特务组织，杀人越货，无日无之。有些热血青年自发起来反抗，黑夜打杀助日寇为虐的汉奸、流氓。而日寇的特务、浪人又借此生事，抗议示威。两市秩序都被搅得大乱。

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必须选定一个日本通做福建省主席，同日寇周旋。陈仪遂被选中。由何应钦出面，要陈仪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为人相当精细，他懂得这是要他“扛木梢”，代人受过，不免踌躇不决。何应钦不得不直接告诉他，这是蒋介石的计策，要他无条件对日寇退让，甚至无条件屈服，不管日本浪人怎样横行都不要干涉，只要不同日寇闹翻脸，保住福建就算立了大功。陈仪就这样上任了，这是一九三三年底。

对日寇的横行践踏，陈仪内心非常不满，但苦于蒋介石的治闽密令，对日寇不得不退让屈服。不过陈仪到任后也不是一件好事未做。对过于猖獗的汉奸、流氓，他令宪兵秘密逮捕格杀，而不声张。虽然如此，厦门、福州两市仍然民怨沸腾，直把陈仪当做大汉奸对待，几乎无人不骂他。大街小巷，遇事都在咒骂国民党，咒骂陈仪不如木偶！老百姓把省政府称为“裴真人庙”（省府内原来即有狐仙裴真人庙，两层的一间小楼），每逢旧历初一、十五，市民成群结队敲锣打鼓进入省府内，祈求裴真人赐福人民，为人民驱除日寇和汉奸！陈仪只做充耳不闻。

陈仪的苦闷虽可以想见，但依然“好官自我为之”，尽力去做事。他和著名华侨胡文虎有较亲密的关系。得胡文虎大力资

助，陈仪在福建各县设立了地方医院，鼠疫、疟疾两大患逐渐减少。同时开办闽省干部训练团，陆续培养了好几千县区级各科科长、区长、科员等，保障他们的工作，不随县长调动而调动。又严办了一批贪污的地方行政人员，盗匪也随之减少。这原是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但人民也可少受一些欺压。这当然是改良主义的措施。

特别是陈仪随时打击 CC 分子，更得民心。应该说，陈仪之反对 CC，最初是出于派系之争，因为一九三三年政学系领导人之一杨永泰被陈立夫派特务刺杀于汉口海关码头；及至后来才发展为对蒋介石的特务统治十分反感。对于军统，陈仪也恨其跋扈，时时有意无意干扰他的行政，因此他时常抓住证据，予以打击。这在沈醉所写的《我所认识的戴笠》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福建人民对陈仪屈服于日寇，恨之入骨，对他留意地方疾病和官吏贪污等事，以及压制打击中统、军统，又感觉到他还有好的一面。而且由于干部训练团的设立，连年招收了好几千青年，并安排了他们的工作等等因素，所以陈仪在咒骂声中还没有激起大的变故。

一九三六年冬，我因沈仲九先生介绍到了福建，认识了陈仪先生。沈仲九先生是五四时期有名的作家，初期相信无政府主义，曾是上海无政府主义的小领袖。他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担任过上海立达学院院长、上海劳动大学代理校长等职，颇有声望。沈和陈又是亲戚，故陈仪请其当顾问，对他十分尊敬，要事一般都和他商量。

沈先生在陈仪面前说我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其实，我在日本虽住了一个时期，不过是闲住，并没有认真读书。陈仪听说我刚

从日本回来，急欲同我交谈，因他久离日本，迫切希望了解日本的近况。初次见面，我们就交谈了很久。主要内容是谈日本少壮派军人和重臣团（从西园寺任首相起形成）的关系。此后，又进一步深谈了日本少壮军人是否会很快向中国全面进攻的问题。我认为日本重臣团基本上已无实力，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则十分猖獗，他们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看来在较短时间内就可能向我国发动全面进攻。陈听了将信将疑。

陈仪问我怎么会结识沈仲九？我告诉他：“一九二三年我在上海大学读书，二四年沈先生就到该校中文系讲授中国哲学史，我选修他的课。”沈先生曾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了一年书，后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不再相信无政府主义，并逐渐同情马列主义。他在讲授胡适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时，批判得很有力。在这以前，我也读过一些哲学著作，有些看法和沈先生并不相同，常私下找他商讨，沈先生极其耐心。我把他的课全部学完，与他建立了较好的私人感情。

陈仪知我和沈仲九先生相处不错，便同意把我留在福建省干部训练团任教。陈兼干部训练团的主任，但他无暇兼顾，由仲九先生任代主任。陈每月至少要到训练团做一次报告，他常讲要廉洁奉公，诸如“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类的话。一般人都说陈主席廉洁奉公。我和他接触后，也有同感。他家中确实没有多少私产。

当时，干部训练团的学生有一千余人，福州人特别多。学生中常有人骂陈仪，说他屈服于日本人，甚至有人骂他是汉奸、走狗。陈是察察为明的人，对人民的愤恨完全知道。但他总以“忍辱负重”来自我解嘲。他又是有志报国的人，有时扪心自问，也

感觉到对不起人民，愤闷之余，时向左右表白：“我总不会出卖国家和人民，作千古罪人。”

一九三七年初，西安事件后，全国各界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准备抗日。不料日帝的台湾总督嘉藤吉利突然致电陈仪，大致说：全台各界定于本年五月一日召开大会，庆祝皇家建设台湾四十周年，特邀先生率领代表团来台观礼，等等。

陈仪接电后，感到是对他的莫大的侮辱，准备断然拒绝！不料蒋介石的密电接连而来，严令陈仪组成大规模的代表团，并要陈亲自率领，按期赴台，不得延误。

陈仪感到十分难堪：福建人民已把他称为大汉奸，向来不予齿数，如果再亲身赴台观礼，不是又表演一次汉奸跳舞吗？这是何等耻辱！退一步说，拼着老面孔走一趟，福建人民会不会群起反对、辱骂，甚至发生不能预料的事变，都很难说。后来他说：当时愁得寝食俱废，想不出退路。最后他和顾问沈仲九、秘书长陈景烈、民政厅长高登艇、财政厅长严家淦等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此事。首先是高登艇、严家淦相继发言：主张必须亲去，不然交不了差，甚至引起外交问题；人民反对、咒骂，只好忍受，等等。沈、陈没有发言。陈仪接受了高、严的意见。

届期，陈仪的代表团共三十多名，清晨齐集省府，直赴江边乘兵舰赴台。不料人民早已探知消息，大街上，凡是重要路口墙上已贴出白纸大字标语：例如“欢送陈主席率亲日代表团赴台！”

“欢送陈主席率亲日代表团赴台祝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四十周年！”等等。陈仪感到触目惊心！然而还是登上了兵舰，乘风破浪而去。

福建国民党报纸奉令发表新闻一律称：陈主席率领代表团赴

台湾参观。

陈仪等在台湾参加了庆祝大会，也公然登台致了贺词，说台湾轻工业发展迅速云云，日本报纸连日刊登中国亲善代表团团长陈仪等到台参加庆祝大会的消息，尤其是对陈仪的祝词，擅加伪造，说陈仪讲：台湾人民不仅丰衣足食，而且安居乐业，这种幸福生活，都是天皇赐予的，等等。陈看了这样消息，不仅啼笑皆非，简直是无地自容！

台湾人民对陈仪及其代表团的活动也特别关切，给亲善代表团团长的信件每天都有数十封，措词则大同小异。例如，质问陈仪：台湾是哪个国家的领土？日本为什么举行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你们参加大会会有什么感想？又问陈仪：你受的是日本教育，知不知道中国有刘豫、张邦昌其人？你愿不愿意做刘豫、张邦昌？再问：你们回国对同胞们有没有骄傲的感觉？你们吃的饭，穿的衣，从哪里来的？等等。

后来，陈仪对我说：每一封信，每一个字，都似一根钢针直刺心窝！在台湾过了数日，好象做了十年囚徒！一九四八年，他曾将这些信件和当时的日记悉数交我保存，要我在他死后为他写一传记，将这些全部公开发表。可惜，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毁于十年动乱之中。从日记上看，陈仪是不甘心被骂作汉奸的，他内心很痛苦。

陈仪回到福州，好多天无脸会客，报界问他消息，一字不谈。蒋介石要他发表观礼谈话，他以沉默拒绝了这项命令。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发表宣言和谈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抗日战争展开。福建怎样办？陈仪开始想到，这样下去，背着大汉奸的恶名，不但不见容于广大人民，即自己的

亲戚朋友，也不能见谅。但怎样抗日呢？手中无兵，唯有坐在省政府里办公文，会客而已。

同年秋天日寇侵占了厦门，从守土有责来说，陈仪应该有所表示，可是蒋介石仍令他待机观变。接着，十一月上中旬，日寇的军舰时常在厦门、金门海面游弋。一日逼近金门，金门县长邝汉惊慌失措，带着眷属和科长等乘准备好的小轮船离开金门，径回福州。邝汉逃走后好几日，日军才进驻金门。陈仪查明这件事，将邝汉枪决，说他不能守土，日寇未到，事先逃走，致使金门人民遭到极大损失，罪不容诛，等等。不料，舆论并不支持陈仪，报纸上先后刊登了好几篇文章，都指出：福建当局向来亲日媚日，特务、浪人横行无阻，福建早已沦为殖民地，所以才有邝汉这等汉奸式的官吏。试问枪决了邝汉，冀图解释或掩盖什么？请明白答复，以释群疑。还有文章为邝汉“呼冤”，说陈仪并无抗日的明白表示，他本人也守土有责，为什么只办邝汉？！

陈仪是有理智、有良心的，他对人民和报纸的指责、质问，只能哑口无言，背地里深自懊恼、忏悔，然而舆论总是沸沸扬扬，指桑骂槐，依然把他视为汉奸。

这次风波闹得很大，蒋介石当然知道，他没有责备陈仪，反把福建绥靖公署（设在南平）主任蒋鼎文及其部队调离福建，委任陈仪兼绥靖主任。陈仪意外地获得这一兼职，认为借这个头衔，可以调动全省驻军，抗日多少有些资本，打击特务也更有力量。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突然逃出重庆，二十九日发表通电（艳电）公然背叛祖国和出卖人民，认为只有同日本言和（投降），才是救国救民的方针。接着由河内飞到南京，拜倒在日寇脚下。全国声讨汪精卫。陈仪认为他洗刷耻辱的机会来了。他没

有和幕僚商量，突然在绥靖公署向记者发表谈话，痛斥汪精卫背叛“党国”，投降日寇，败坏大半生名节，成为“党国”罪人，到头来必然身败名裂！试看历史上有哪个卖国贼能够一生身名俱泰的？！接着声明：福建早已把我当做卖国贼汉奸看待，这是应该的。我任职已经五年，对日寇一贯退让屈服，福州、厦门成了日寇的殖民地，种种罪恶都由日本特务、浪人乃至中国的流氓做尽。我知道广大人民万分痛恨。过去我为国家大计，不敢随便发表谈话，今天我直告大家：福建是日寇久已垂涎的地方，中央（未敢提出蒋介石）非常重视闽海的安危，令我忍辱负重。我体察中央的用心，不得不在福建对日寇屈服，争取日寇推迟侵占福建，解除中央东顾之忧，所以不惜负着种种罪名与日寇相周旋。现在日寇已侵入闽海，占领了厦门和金门，再无和日寇虚与委蛇的必要，只有领导福建两千万军民，赤诚拥护领袖蒋委员长，决心抗日，直到恢复失地，全面胜利为止。同时宣布，沿海地方政府和海防部队捉获日本特务、浪人以及为虎作伥的中国流氓、汉奸，一律枪杀勿论。严禁任何人假借名义（按：军、中统特务往往假借搜集情报，派船到厦门、金门和三都澳等岛屿走私）派出船只到日寇占领的岛屿走私，违者以通敌论罪。

紧接着陈仪将日本人在福建设立的烟馆、妓院统统封闭，未及逃走的日本浪人也全数逮捕；并派出大批军事人员分赴沿海，协同地方政府的自卫队在沿海布防，以省保安团和留下的少数国军分驻沿海重要城市，监督地方防军。次年又在泉州市设立前方抗敌指挥部，任命福建省保安处副处长柯远芬为指挥官，拨三个保安团归柯调动。在漳州市驻国军一个师，师长为胡璉。

从此，福建才有些抗日的气氛。

尽管陈仪发表抗日声明时表示理解蒋介石的方针，也说了要拥蒋抗日，但压力还是随之而来。因陈仪的声明事先未报告蒋介石，而且使福建百姓对陈仪的指斥转向蒋介石。声明发表后，蒋大为震怒，数月不和陈仪通电报。陈仪知道不妙。后据蒋的侍从副官向陈仪透露，原来蒋介石认为抗日夜长梦多，徒令共产党逐渐壮大。因此，他早已企图和日寇私下言和，勾勾搭搭已非一日。汪精卫侦知这个密谋，抢先一步投降日寇。这一着固然严重地打击了蒋介石，但他并不灰心，自认威望、实力、政治地位都高于汪精卫，依然是日寇争取的对象。所以他一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始终不愿和日寇截然断绝关系。陈仪的声明不免泄露了天机，因此使蒋震怒。

陈仪深知蒋介石对部下有功者，片刻忘去；有过者，终身不忘。他考虑蒋介石会把他免职，遂暗作准备。

陈仪这次虽然没有被免去军政职务，可是蒋介石头脑中给他记下一笔账。

福建人民对陈仪则是另一种看法：不再骂他卖国贼、大汉奸。同时对蒋介石更加痛恨。

在行政院和陆大坐冷椅子 认清蒋家政权本质

一九四一年秋，陈仪终于被蒋介石免职下台。陈仪到了重庆，蒋介石对他的态度相当冷淡，陈却一切坦然。这时他似有些忏悔式的觉悟，自己检查在闽数年，一部分精力用在对日屈服方面，一部分精力用在征兵征粮（征粮首先是在福建实行的）方面，

都是替蒋服务。可以说，完全没有替人民做一件事，反之，对人民却有许许多多危害、骚扰。然而下台之后，人民不记旧恨，且宽容谅解。蒋介石则不然，只因自己不愿死心塌地做汉奸，替他扛木梢，就被一脚踢下台来。因此，陈感觉到对福建人民负了一笔债，对蒋不免暗暗生恨。当然，这时陈仪之恨蒋，仅属于他们的内部矛盾。

陈仪选择了僻静的山区住下，自以六十老翁无所求，反觉无官一身轻。住了不久，到一九四一年蒋介石突然召见，提出要他到行政院充秘书长，陈不敢提什么意见。事后知道，由于何应钦、张群等一再提及，故有此任命。

当时行政院长由蒋介石兼，实际上是副院长孔祥熙负责。陈就职前，蒋吩咐了许多话，大致说，他自己很少工夫到院处理政务，孔副院长不免糊涂，院中闹得很不成体统，故请陈任秘书长，希望陈认真替他整肃一下。如有做不通或棘手的地方，可去找他，他会支持陈，等等。

陈仪拜访了孔祥熙，则另有一种气氛，孔十分谦虚，但不涉及行政院事。无可多谈，陈半小时即告退。告退时，陈仪说他准备某天到差。孔答：随便吧，多休息几天也无碍。

到差那天早晨八时左右，孔不到，院各厅、处长也无一人来，只有科长、科员大约九时后才陆续来签到。直至十时以后，厅、处长等才零零落落来上班。整个行政院冷冷清清，不但没有抗战气氛，连办公时间也不遵守。厅长、处长上班后曾来见过陈仪，只稍谈一下便辞去。陈仪和这些人约定明天上午八时在行政院开一次座谈会，了解一下情况。次晨，陈仪先到，直至九时半，厅、处长才姗姗来到。座谈开始，陈问有没有本年的工作计划？

谁也答不出。要求厅、处长拟定一个临时工作计划，没有人承担。陈仪不得已要求大家按时上下班，大家勉强同意了，可是表示得有气无力。谈了一个多小时，什么结果也没有，只有散会。

这以后，陈仪以身作则，每晨八时就到行政院，坐着无聊，到处走走，发现连值班人员都到九时才上班。科长等人办一下例行公文，没有事便坐着聊天。陈仪开始很天真，认为秘书长应有一定的职权，但谁人眼中似乎都没有什么秘书长，于是陷在苦闷中。

隔了几天，孔祥熙偶然来一次，厅、处长不约而同相继到齐，围着孔祥熙谈一阵，孔一走，大家便一齐走开。按规定：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会，每月举行行政会议。纪念周会，不但孔祥熙不到，厅、处长也大半不来。陈仪总是做主席，向下一看，疏疏落落，仅有上百名参加者，他也顿时泄了气，讲什么呢？敷衍几句话了事。行政会议，孔祥熙虽然照例到会担任主席，总是谈些例行公事，有关国家大计的事，很少谈到。

不到两个月，陈仪完全失望，他料不到堂堂皇皇的国家最高行政机构——行政院，实际是一官僚养老院。陈仪笃信孔孟哲学：“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他想辞职，但又怕蒋介石给他难堪，于是忍气吞声，天天上班下班。

陈仪看破红尘，学会敷衍了事。有时出门访问亲故，哪知不待探询，许多人已向他道出行政院内幕：孔祥熙和特务头子戴笠打得火热，戴笠和孔二小姐也不是绝对干净。他们不但贿赂公行，而且明目张胆地结伙走私贩毒，利用职权投机倒把，历次黄金风潮大都是行政院制造的。同时陈也因参与了一些机要，约略了解一点蒋与美帝的勾结、向日本妥协投降的秘密，暗中感到，